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

肖贵清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 年第 7 期撰文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不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机械相加，而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

的统一整体，整体性是其基本特征。这不仅体现在它的内在有机整

合，而且还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1992 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与党的十四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从 1992 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发展时期；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七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逐步成熟时期。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虽各具特色，呈现出理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但是它们却有着共同的指导思想、根本任务、价值取向、理论精髓，体现了理论发展的一脉相承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实现祖国统一的构想和外交战略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

分析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对于全面、准确地认识和理解这一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自《新华文摘》)

城市化进程中循环型城市的构建

刘磊在《理论界》2008 年第 9 期撰文指出，当代中国城市化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期，城市化过程既是城市社会财富有效积累的过程，也是城市资源与能源消耗的过程。当前，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着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急剧增长的人口压力、日趋严重的资源危机、不堪重负的交通拥挤等问题。因此，积极构建循环型城市，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循环型城市以污染防治为出发点，以物质循环流动为特征，以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最大限度地高效利用资源和能源，减少污染物排放，是一个以人为主导、以自然环境系统为依托、以资源流动为命脉的经济、社会、环境协调统一的复合系统。加快推进循环型城市构建应重点解决的问题是：一、把生态设计、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以及绿色消费等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作为城市建设的切入点和最佳形式；二、把建立人、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互为一体并相得益彰的宜居城市作为循环型城市的目标；三、在建设循环型城市过程中既要有政府的动员、组织和推动，又要发动市民广泛参与；四、重视引导城乡所有人员普遍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在全社会形成节约资源的良好风气。

(摘自《新华文摘》)



摘自《新漫画》

观点集锦

科学发展观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吴波、张晓敏在《理论视野》2008 年第 6 期撰文指出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但就其所蕴含的一般性而言，无论在发展本质、发展目的还是在发展所依托的制度和体制方面，科学发展观都以所蕴涵的鲜明社会主义价值属性和所依托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与西方发展观从根本上区别开来，是对西方发展观的历史性超越。正如胡锦涛同志所强调的，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依照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本质就是要求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并为之提供切实的制度保障。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是蕴涵社会主义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和发展目的的总体的性概念。它所明确的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一定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历史地位，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的利益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作为社会主义发展观的一次新概括和新总结，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与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相统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社会全面发展相统一，坚持人的发展与尊重自然相统一，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我国垄断行业规制改革具有复杂性

张耀伟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 年第

8 期撰文认为 我国在经济转轨中市场主体的缺失和行政垄断的存在，限制了经济垄断的形成。因而在现实经济中，依附于自然垄断之上的过度行政性垄断与经济性垄断缺失并存，这决定了我国垄断行业的规制改革和反垄断更具复杂性，呈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垄断问题截然不同的特征。第一，行政性垄断依附于自然垄断之上，表现出双重垄断的复杂性，形成过度的行政性垄断与经济性垄断缺失并存的局面。第二，畸形、错位的规制体系。依附于自然垄断之上的行政性垄断是当前垄断的本质特征，而当前的规制体系试图在保留双重垄断内核的基础上规制自然垄断问题，因而必然是畸形、错位的，过度的行政干预与有效的规制体系缺失并存。由此，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应从两个层面展开：第一，首先要破除依附于自然垄断之上的行政性垄断；第二，在破除行政性垄断的基础上，针对自然垄断行业的内在属性构建相应有效的规制体系。

民主的重要特征就是按程序办事

赵振宇在 2008 年 7 月 5 日《湖北日报》撰文指出 民主是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按照多数人的意志，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决定的制度。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但人民当家作主不可能完全按照每一个人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只能按照多数人的意志对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项进行决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公民在当家作主的过程中，也必须是“有序的政治参与”，而不是随心所欲，更不是无政府主义。民主的重要特征就是按程序办事。多数人的意志要通过程序才能表现和承认。如果多数人的决策和选择出现错误，也只能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改正。所以，程序化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对程序的重视程度，标

志着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程度。程序是人制定和执行的，如果人的素质本身不高，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程序，即使有了好的程序，也会在实践中扭曲变形。所以对于程序的设计，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因为它是我们一切工作和决策的基础和前提；同时，我们也不能把一切都寄希望于程序，好像有了程序就有了一切。正如制度不是万能的一样，程序也不是万能的。

协同治理：服务型政府的治理逻辑

郑巧、肖文涛在《中国行政管理》2008 年第 7 期撰文指出 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全新的行政理念和政府模式，蕴涵着公民本位、公平正义、公共责任等价值诉求。服务型政府的价值理念以一种内化的方式渗透到政府治理模式的选择中，引领着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和创新，因此，以寻求公共利益与共同体普遍共识为目标的协同治理便具有了强大的驱动力。协同治理作为服务型政府的治理模式，一方面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形成的一个开放系统，通过非线性的互动演绎整体的合作效应，产生扩大的生产力，创造行政现代性所追寻的服务中心主义和责任至上主义，使满足公共需要的政策和项目得到有效、负责和公平的实施；另一方面，是服务型政府实际运作过程所选择的公共政策工具，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主体通过面对面合作方式组成社会网络管理系统，强调社会管理的多元化和有效政府的功能角色定位，将焦点转向致力于解决公共问题，创造出公共生活的良序，从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可见，协同治理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回归。现代社会的各级政府应当更新治理理念，完善公共治理结构，匡正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真正实现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考

我国楚汉战争史上“暗度陈仓”这一留传千古的史实，被载入众多的史籍中。但在不同的史书中对有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事件的记载，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含糊不清的说法。如：烧毁了哪一条路的栈道，是刘邦还是张良烧毁栈道；关中至汉中的交通情况是怎样的；“暗度陈仓”是张良的预谋还是韩信的计谋；为何有的书提到“明修栈道”，有的书则只是提“暗度陈仓”。冯镜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 年第 4 期撰文指出，1.张良送刘邦从关中前往汉中，于途中返回关中时烧毁了所过的褒斜道栈道，排除了刘邦烧毁褒中至南郑（汉中）一段路栈道的说法。2.从关中东至汉中有三条路，排除了烧毁褒斜道栈道是断绝后路的说法，以及放着另外两条路不走，而去明修褒斜道栈道能够欺瞒敌方的说法。3.“暗度陈仓”不是张良早有的预谋，而是韩信的计谋。4.“暗度陈仓”时，没有与之相配合的“明修栈道”之举。“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应为“不修栈道，暗度陈仓”或只提“暗度陈仓”。

屈原名“原”字“平”非名“平”字“原”

黄毅、章培恒在《学术月刊》2008 年第 8 期撰文指出，作为中国最早的伟大诗人屈原的名、字已被长期颠倒——名“原”字“平”被颠倒为名“平”字“原”。这种错误至迟始于北宋，到南宋时期逐渐被世人所接受。与此相应，记述屈原名、字的最早两种文献——《史记》和《楚辞章句》的有关内容也遭到了篡改。幸而南朝的《文选》和唐朝的五臣注《文选》还保存了这方面的正确信息，《楚辞章句》中也保留了被篡改的蛛丝马迹，所以，可据此考证出事实的真相。因为：其一，在《文选》五臣注的早期刊本中，“《史记》云：屈原字平”这一句并无异文。其二，从《文选》的体例来看，在萧统编《文选》时，本是把“平”作为屈原的字而不是作为他的名的。其三，今本《楚辞章句》的《离骚章句》中对屈原名字的解釋存在着明显而严重的矛盾，很难想象这样的矛盾是由王逸的思维混乱所造成；把它解释为传写或刊刻过程中的错误则要合理得多。这一事情同时意味着，对于自古相传的成说——包括屈原名、字这样具体问题，都应依据今天的认识水平重加审视而不能全部恪守。

明代汉藏有别的佛教政策析论

任宜敏在《人文杂志》2008 年第 4 期撰文指出，对于中国社会信众广泛，影响深远的佛教，朱明王朝采取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各有特色的控制策略，以巩固皇权。对待汉传佛教的策略，可巩固皇权。然而尊崇的目的，实在于希冀佛教为皇图永固服务。故其所创之僧官体系，控制严密、政治色彩极其浓厚；对佛门教团的严厉整顿以及所颁《周知板册》、《寺院名册》、《申明佛教榜册》、《榜示宗教条例》等，规定之琐细、人身控制程度之严酷，不仅为历代所未见，比之为控制全国民户所制定并推行的“黄册”和“里甲制度”，亦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对于藏传佛教，一方面废除旷世无匹之帝师制；另一方面从保障国家统一的角度考量，又多沿前朝旧贯，加意安抚，可谓相当优礼。朱明王朝对藏传佛教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一系列优礼方略与制度安排，使得“惟僧言是听”的藏区各派政治势力倾心内附，奉贡请封者交错于途，从而为明廷赢得了“西陲宴然”之硕果，“终明世无番寇之患”。

(摘自《新华文摘》)